

THE SHAME OF THE CITIES

美國美

——城市的耻辱

[美] Lincoln Steffens 著

朱晓 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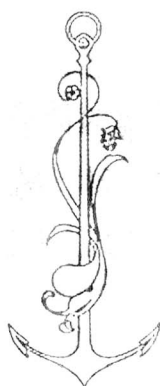


海南出版社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THE SHAME OF THE CITIES

美國美

——城市的耻辱



[美]Lincoln Steffens

朱晓 译注



海南出版社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粪：城市的耻辱 / (美) 斯蒂芬斯著；朱晓译

注. ——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 11

ISBN 978 - 7 - 5443 - 4774 - 7

I. ①美… II. ①斯… ②朱… III. ①社会问题 - 研究 - 美国 IV. ①D771. 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0874 号

美国粪——城市的耻辱

原 著：[美] 林肯·斯蒂芬斯

译 注：朱 晓

责任编辑：李升召

技术编辑：朱 晓

装帧设计：李宁超

印刷装订：长沙长大成彩印有限公司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 编：570216

电 话：0898 - 6681277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10.75

字 数：156 千

书 号：ISBN 978 - 7 - 5443 - 4774 - 7

定 价：19.80 元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更换

目 录

引言与推论	1
圣路易斯的特威德时代	20
明尼阿波利斯的耻辱	36
圣路易斯的无耻	53
匹兹堡：令人羞愧的城市	76
费城：腐败还自得	99
芝加哥：一半的自由与不断的斗争	122
纽约：面临考验的好政府	149

引言与推论

这并不是一本专著，只是将我发表在《麦克卢尔¹杂志》²上的文章结集重印。这些文章当初是被当作新闻作品来写的，现在也依然还是新闻作品，即使它们有了新的出版形式，我也不会产生更多的虚荣。这样的分类，看上去好像够狂的；假如我胆敢自认为我给我的行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的话，那我肯定就是狂妄了。不过，这无关紧要，我坚持认为这些就是新闻报道。从各成卷册的《麦克卢尔杂志》中抽出各篇来，几乎不作修订，重印我作为一个报道美国城市之耻辱的记者的报道集子，自有我正当的理由。这些文章都是我带着一个目的写成的，都是杂志社带着一个目的刊行的，而现在，为了深化这同一个目的，它们又被重印在了一起，这目的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要从似乎不知廉耻的市民品行当中唤醒公民自尊心。

我们推想，世间必定存在公民自尊心这样的东西。我们一切矫饰的自吹自擂不能变成空洞的虚夸，我们假借崇高名义的自命不凡也不能变成空心的绣花枕头。科学、艺术和商业领域里的美国成就，实质上解释了过硬的能力，而我们的虚伪也影响到了关于基本道德准则的民族观。甚至在政体上，我们早就表现出了潜在的伟大，而我们政治上的不足、失灵、失败并不绝对；它们只不过是荒唐。但这是我们自己的荒唐。代表我们的，不单有杰出的成就，还有失败、毁灭；也不单有杰出的政治家，还有贪污贿赂者，这是真实不虚的。为什么不这样来理解它、来谈论它呢？

我听说，这是因为，美国民众不会“接受”它。你可以归咎于政客，当然，或许可以归咎于一个阶层，但是不可以归咎于所有阶层，不可以归咎于全体人民。甚至你可以归咎于愚昧的外来移民，或者任何一种国籍的人，但是不可以归咎于所有国籍的人，不可以归咎于美国人民。但是，错不在哪一个阶层，不在哪一个种族，也不在哪一种特殊的利益或者利益相关者、利益集团的群体。祸害美国人民的弊政，是由美国人民自己造成的。

在我规划我的漫游的时候，一位耿直的纽约人很正直地对我说，我会发现爱尔兰裔——信天主教的爱尔兰裔——在所有地方都是弊政的根子。

我去的第一个城市是圣路易斯，一个日耳曼裔的城市。下一个则是明尼阿波利斯，一个斯堪的纳维亚裔的城市，新英格兰人在那里居领导地位。然后我来到了匹兹堡，一个信奉长老会教义的苏格兰裔的城市，我那位纽约朋友正是如此。“啊，他们可都是外来人口。”我听他如是说。下一个城市是费城，在所有城市中最纯正的美国人社区，也是最不可救药的。那之后我来到了芝加哥和纽约，两地都是种族杂居，一个取得了改革的杰出成果，另一个则树立了我所见过的好政府的最佳典范。“外来人口”这种借口，是让我们看不清我们自己的伪善的那些谎言之一。

源于我们的自大的另一种类似的牵强想法是薄政厚商。这是典型的美国公民的悲叹。如今，典型的美国公民就是商人。典型的商人不算好公民；他忙。倘若他是一个“大商人”，忙极了，他倒不会罔顾政治，他会忙于政治活动，呵呵，极忙也极有效率。我发现，他在圣路易斯收买受贿者，在明尼阿波利斯为贪贿者辩护，在匹兹堡引起腐败，在费城跟党魁大佬头们各有分担、共同分享，在芝加哥强烈反对改革，在纽约用腐败资金搅和好政府。这样的大商人，他就是一个自以为有道德的骗子。他是堕落恶行的首要源头，假如他罔顾政治，那倒是福音了。可他绝对不是罔顾政治的商人；名流才是好公民，才是典型的商人。他太不得空闲，他不需要政治因而也没时间从政，到了他的疏忽纵容得坏政府腐败太甚以致于他被激起行动的时候，他不满意了，于是他审时度势寻找对策，见效必须要快，以便他可以赶紧回到店里去。自然地，每当他谈起政治，他总是话不离本行。他别出心裁的补救办法是假充内行的，说的还是生意。

“找个商人来吧。”他说（他的意思是“像我一样”的商人），“让他把经济的办法引入到政治活动里来，引入到政府里去；到那个时候我得自个儿抽身去照管自己的生意。”

从联邦参议员到全国任何地方的市政委员会委员，很难得有一个职位不由此等商人获选就任的；然而政治依然腐败，管理相当糟糕，而自私的市民不得不让自己作好准备，像过去的志愿消防员一样，为了防火，不分昼夜、风雨无阻向前冲；而他间或会走出店来，（在损失造成之后）他也会把火扑灭，然后他回到店里，一边思慕着从政的商人。商人在政治上，和他在公民应有的品行上一样不及格。为什么呢？

因为政治就是生意。这就是政治怎么了的原因之所在，也就是一

切——艺术、文学、宗教、新闻、法律、医药——怎么了的原因之所在，它们全都是生意，而且全都——如你之所见。把政治做成一种体育竞技，就像人们在英格兰所做的那样；或者，把政治做成一种职业，就像人们在德国所做的那样。这样，我们就会得到——唔，不一样的东西，除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之外——我们是否想要这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千万不要企图和银行家、律师、干货商一起去改革政治，因为这些人都是商人，他们完成改革一般存在有两大障碍：一是他们不同于政治家，但在追名逐利上和政客却是一样的；另一个障碍是政治并非“他们的专长”。这两方面倒是都有例外。许多官员下台经商，后来做得还不错（坦慕尼³出身的前市长们，以及差不多每一位费城昔日的党魁大佬在他们的城市里都是重要的金融家）。商人参政也有做得不错的（例如马克·汉纳⁴）（Mark Hanna）。但是，他们并未革除他们所转入的政治这个行当里的弊病，尽管他们间或极其突出地激化了弊病。政治家是特种行业里的商人。当别的什么行当里的一个商人学会了政治事务，他就成了一个政客，他可没有多少改革的干劲。打量一下联邦参议院，你就会承认我所言不虚。

重商的精神是赢利精神，不是爱国的精神；是讲信用的精神，不是讲廉耻的精神；是个人致富的精神，不是国家繁荣的精神；是交易和讨价还价的精神，不是讲原则的精神。“我的生意是神圣的，”商人在内心深处说，“凡是让我的生意兴旺的东西，就是好的；必然如此。凡是妨碍生意的，就是坏的；必然如此。一次贿赂是不体面的，换句话说，收取贿赂是一件有害的事儿；但是赠送一笔贿赂还算不上太坏，只要这对我的生意是必要的，就不坏。”“公事公办”（“Business is business”）并不等于从政的情操，可是我们的官员抓住了这句话。对于贿赂，他基本上持同样的观点“生意就是生意”，不过，靠着把他所有的轻蔑都堆到行贿者的头上，他保全了自己的自尊，因而他就有了坦率的巨大优势。“这是不正当的，或许吧，”他常说，“但要是一个富商负担得起跟我交往的费用，谋求实利，或者为了增加他早已巨额的财富，我就负担得起部分地满足其要求的后果，为了生计。我并不标榜具备美德，即使是在礼拜日也不标榜美德。”那么如此看来，按照这种要求，比起提供坏政府或者好政府的商人来，那提供了劣质货或者优等货的商人又如何呢？

但是，就我们政治上的商业主义而言，希望还是有的，并非只有绝望。假如我们政治上的领导人无一例外都是从政的商人，他们也会满足我们可能产生的任何需求。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坚决要求有一个好政府。党魁大佬让我们分成党派，对他而言，党派只不过是达到其腐败目的的手段。他“脱”他的党，但我们决不可以；行贿者改造了他的党，从一次选举到另一次选举，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但忠实的选民决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假如忠实的选民不比政客和贿赂者更关心他的党，到那时公正的选票就会占优势，这将不利于——贪污贿赂。忠于一个惯于从我们手里夺去我们的独立自主的党组织领导核心，这样的忠诚真是犯傻。如果我们可以把党派交给政治家、交给政客去管理，还可以不投这个党的票，甚至不是投谁谁谁的票，而是投这个城市以及这个州乃至这个国家的票，我们就可能管理好党派、城市、州和国家。如果我们可以就政党在竞选时所提出的、更有指望的候选人名单来作集体表决，甚至，如果两党同样地有害，我们可以撵走执政的那个党，然后等下一次选举，到那时再撵走执政的另一个党——假使那样的话，要我说，重商的政客可能就会意识到一种对好政府的要求，于是他可能会顺应这一要求。这个过程可能要花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时间来完成，因为今日之政治家、政客们实在不明白何为好政府。但是，养成坏政府花了那么多时间，到头来政客们都清楚何为坏政府。如果局面不“和谐”，他们就可能会为提议别的东西，然而，倘若民众的要求很坚定，他们——因为日趋商业化——倒可能会“如约交货”。

可是，人民想要好政府吗？坦慕尼协会说人民不想要。人民真诚吗？人民比坦慕尼协会品德更好吗？他们比商人和政客品德更好吗？我们腐败的政府究竟算不算代议制的？

罗斯福总统(President Roosevelt)⁵受人讥讽，因为他在全国四处走动，竭力鼓吹根治我们的美利坚恶行的一剂良药，就是个人身上的品行优良：淳朴、正直、勇敢和效率。“陈词滥调！”老于世故者说。陈词滥调吗？倘若我的观察和言论真实不虚，罗斯福先生的改革方案完完全全获得正式通过就可能会导致一场革命，对现有的制度习俗和社会公共机构，从国会到教会，从银行到选区组织，罗斯福方案比社会主义甚至比无政府状态更加激进、更加可怕。呃，这将改变我们每一个人——不单改变我们的邻居，

不单改变那些用不正当方法谋取权钱的人、贪污者、受贿者、贿赂者，还包括你和我。

不，我们受到鄙视的政治活动当中那些遭人蔑视的方法，就是我们自夸的商业活动当中最重要的方法，同时，公共事务中令我们惊愕的堕落恶行，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私人事务中也经常这么做。让你的妻子介入社交活动或者把一句讨人喜欢的话写进你的书里是一种拉扯，而让一个马屁精当官、让一个小偷出狱还有让一个富家子进入一家公司的董事会又是一种拉扯，两种拉扯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本质上的不同；一个工会联合组织、一家银行的腐败与一架政治机器的腐败之间也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一家托拉斯的挂名董事和一级议会中与秘密预备会议密切相关的成员之间也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劳工大佬如萨姆·帕克斯(Sam Parks)者、银行大佬如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⁶者、铁路大佬如摩根(J. P. Morgan)⁷者和政坛大佬如奎伊(Matthew S. Quay)⁸者之间也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大佬不是一类政客，而是一种美国制度，这制度是得到了解放却还不具备向往自由之精神的民众的产物。

这根本就是一种道德上的弱点；这软弱正存在于我们自以为最强壮之处。噢，我们都是虔诚的——在礼拜日；我们也都“非常地爱国”，在七月份的第四天。但是，我们付贿赂给看门人以图损房东而利我们，相对于为了宣传城里的一条行业街而传递给市政委员的贿赂，这可算是小兄弟；而相对于为了使气闸这种救生的发明在其铁路上得到采用而让给铁路公司总裁的气闸股份，也可说贿赂是股份之父了。至于贪污贿赂、铁路免费乘车券、酒馆和妓院的保护费，还有搀水股票⁹，所有这些都属于同一类东西。我们还可悲地为我们的民主制度和我们政体的共和形式而骄傲，为我们崇高的宪法和我们公正的法律法规而骄傲。我们是自由、独立自主的民族，我们自主管理，政府也是我们的。实质就在于此。应受谴责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我们那些领导人，因为我们支持他们。我们任由他们把我们对美国的忠诚转变为对某“党”的忠诚：我们任由他们指挥党、将我们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转变成独裁政体并将我们的共和国转变成成为富豪统治的国家。我们哄骗我们的政府，我们还任由我们的领袖们盗抢它，而且我们让他们用甜言蜜语从我们这里骗走、收买我们能左右一切的威权。不错，他们替我们通过了严密的法律，可我们也甘愿任由他们通过恶法，作为交

换，公共财产大家拿；而我们的良法——通常不能实行——我们容许有人把它们用作压制的手段和敲诈勒索的手段。那么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违犯我们自己的法律、盗抢我们自己的政府——混迹于海关的女人、以私刑绞死人的暴民用他的绞索、实业巨头用他的贿赂和他的减免退税。用不正当方法谋取权钱的精神、目无法纪的精神，就是美国精神。

这话说不得吗？绝对没错吗？大无畏的纽约地方检察官杰尔姆（William Travers Jerome）¹⁰常说：“你可以明说你思考美国民众所得的任何话。要是你對自己真诚，你就可以对他们开诚布公，而且他们不但会原谅你的坦率，也会原谅你的误解。”这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满怀希望的有民主精神的人的主张，也是他的经验。谁总在顾左右而言他？谁总是说“嘘”、说“惯例是什么？”、当一切都糟透了还说“一切都好”？这么说话的是贪贿者；也有胆怯者，不过是贪贿者鼓动了胆怯者。“做加法、利均沾、守秘密”的信条成了贪污贿赂的教义。“不要危害党”、“要珍惜本市的清白名声”都是贿赂者的呐喊。7月4日独立纪念日演讲¹¹是贪污贿赂的“烟雾弹”，其中全无爱国心，只有不忠。它是做贼的台词。贪污贿赂者们需要“繁荣昌盛”和“党”这样的旗帜来振奋人心——就像一个拦路抢劫的强盗命令“举起手来”而这时我们不停地挥手、不停地喊叫一样——他们从高扬国旗到高扬党旗，把党国改造成成为贪污贿赂的渊藪，把繁荣昌盛转变成一种投机性经济繁荣，以图造成“弱手”¹²——华尔街用语的用法也一样——“弱手”们持有换水股票而与此同时强手们控制住了相应的财富。“责备我们可以，责备任何人都可以，但是要赞美人民”，这，是政客们的忠告，不是尊重人民的忠告，而是蔑视人民的忠告。凭藉像这样的废话空谈，恰似弄臣们利用没有权威的君王衰退的智力一样，大佬头头们——政界的、金融界的和实业界的——正在糊弄、愚弄我们独立自主的美国公民的品行；而且——这也是——他们在渐渐地腐蚀美国公民的品行。

何况这样的公民品行，是可以收买的。“我知道帕克斯打算要干什么，”纽约工联的一位工人说，“可是我在乎什么呢，他提我的工资，就让他得他的贿赂吧！”费城的商人也说了同样的话：“比起他们应该从市里得到的酬劳来，党的领导人或许会拿得要多一点，但是这对我并没有妨害。这也许会提一点点税，可是我受得了。党让保护性关税不下降。那要是被削减了，我的生意可就毁了。只要党坚持这一点，我就会坚守党的

立场。”

人民并不是无辜的。这一点在本书这些文章所有的新闻报道里，是惟一的“新闻”，很可能，对众多的观察者来说这并不新鲜，对我来说却很新鲜。当我圈定范围要描述某几个典型城市里的腐败体制时，我本来是想简明地指出民众是如何受蒙蔽、被辜负的。然而，正是在第一个调查里——调查圣路易斯——惊人的真相毫无遮挡地展现了出来：腐败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它也出现在财政金融上、商业上和社会生活当中；贿赂的枝蔓、派生影响和后果是如此地复杂、如此地多种多样又如此地广泛深远，即使是大智者也很难理解它们，就连福克(Joseph W. Folk)¹³这位孜孜不倦的公诉人也做不到一一领会。这样的状况，在韦特莫尔(Claude H. Wetmore)和我共同完成的那第一篇文章里得到了简要的描述，不过描述得还不够坦率。韦特莫尔先生生活在圣路易斯，他敬重名人红人，这些人对我的影响微不足道。等到下一程我孤身一人去明尼阿波利斯的时候，我可以不受约束地看出更多来，没有了对各路人物的敬重，就有了同一现象的蛛丝马迹。第一篇写圣路易斯的文章以“圣路易斯的特威德¹⁴时代”为题，尽管当地“大多数市民”得到了关注，特威德们却是关注的中心。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耻辱”这一篇，明白的事实被写进了标题里；这就是明尼阿波利斯的耻辱；不是埃姆斯¹⁵政府的耻辱，不是特威德们的耻辱，而是这个城市及其市民的耻辱。不过，明尼阿波利斯大约不像圣路易斯那么腐败；警界贪腐也不像贿赂那样普遍。警界贪腐更骇人听闻，但它太肮脏，不可能大面积地牵涉到社会生活。因此，我回到圣路易斯，再一次全城走访，心里想着当地民众，而不是单单想着那几个被抓住、被定罪的贿赂者。这一回，“圣路易斯的特威德时代”的真实含义被我说明白了，这篇文章以“圣路易斯的无耻”为题，而这也正是这篇报道反复要说明的意思。在匹兹堡，民众也是腐败的主体，尽管那里的市民精神好一些，遍及当地公众的社交组织当中腐败的范围之广早已有人指出。但是，甚至直到我着手调查费城为止，还没有人指出：人们对大众化腐败可能发生的情况，计算出了蒙羞坦白的限度。这正是这一类调查研究的空间，在这个国家里，这是最好的调查空间了，可能辛辛那提除外。无可否认，费城不单是腐败，同时也受到腐蚀，这是明摆着的。费城被我归因于——美国的老百姓。

以一篇杂志文章的篇幅去涵盖任何一个城市的市政府的方方面面，是不可能的，因此我选择了几个在某一方面或者某些方面具有最突出特点的城市。因此，正如圣路易斯是贿赂的典型；明尼阿波利斯是警界贪腐的典型；匹兹堡例示了一个维护派系私利而不讲原则、经济上依赖工业的核心组织；费城则是普遍的市民腐败的典型；同样，芝加哥是改革的一个实例，而纽约则是好政府的一个实例。所有这些情况都发生在这些地区大多数的城市里。圣路易斯现在有、很早以前就有过改革派，而那里到今天还存在警界贪腐。明尼阿波利斯完成了反贿赂和市政委员会的改革，可是贿赂再一次在那里爆发。匹兹堡存在普遍的腐败。费城则有一个极其完备的维护派系私利而不讲原则的核心组织。芝加哥有警界贪腐和一种低级的行政腐败和普遍性腐败，这样的腐败广泛感染了商行、工会乃至社会生活。至于纽约，这个大都会可以作为美国各大城市随便什么地方所发生的几乎任何事情的典型，但是多年以来，没有哪个城市拥有像市长塞思·洛¹⁶的政府那样好的政府。

我择定每一个城市来代表的，是其发展到了最高水平的特征。比如，圣路易斯，跟芝加哥差不多，要在这里寻求有组织的改革可能显得滑稽可笑；或者在离明尼阿波利斯那么近的芝加哥要寻找贪污贿赂也显得愚蠢。在明尼阿波利斯之后，对芝加哥的行政腐败的描写看来是一种重复报道。或许，在每一个地点只表现惹人注目的因素，并不公平。可为什么我就该公平呢？我不是在作裁决；我才不没来由地把这样的职责归之于己呢。我不想为芝加哥写芝加哥，倒是想为其余的城市来写芝加哥，因此我挑出各个城市有什么样的启发以作为其余城市的指南。不过，即使我还不够全面，我也决不夸大其辞。那些文章里的每一篇都是一篇低调的陈述，尤其是在所写城市的形势很不好的情况下，文章只是写了就事论事的证据，尽管每篇文章似乎都让其他城市惊讶而让作为文章题材的那个城市失望。低调到如此的程度，我费城的朋友们——他们知道有什么是人们将会了解的——特别是那些知道我掌握了些什么的人，对我只报道了那么一点点都表示出了惊讶。于是，圣路易斯的一份报纸说“种种证据被人抛给了我而我却没有把它们用好”，这些嘲弄攻击有一点真实性。我从写费城的那篇文章里砍去了两万字，而我的证据还没有用到一半。我认识一个打算分三卷写建造费城市政厅的腐败往事的人，后来因为他篇幅不够用，他还很难

过。你不可以把关于一个美国城市的腐败所有已知的事情全都写进一本书里。

这是极不科学的，可那个时候，我又不是一个科学家。我是一个新闻记者。我的确没有带着中立的态度收集证据然后耐心地排列它们，以供永久保存和试验点分析。我就没有想过要保存，倒是想过要驳倒这些证据。我的目的同我的调查、各篇报道的实质一样不科学；我的目的就是——如我在上文所述——要看看在它们每一种带来耻辱的人或事中日益常见的可耻的事实真相，是否因为我们市民的不知羞耻而不会令人怒火中烧、也不会点燃美国人的自尊心。这就是出于我的目的的新闻报道。我想要感动人，也想要让人信服。为什么我并不是对一切证据都感兴趣、不寻找新证据而且还剔除一半的旧证据，这就是原因。我经常被人要求去揭露一些人们认为可疑的事情。我不能够；何况为什么我就应该这样子去揭露呢？对未可知因素的揭露并非我的目的。当地的民众：他们愿意容忍什么、他们如何受人愚弄、他们被人收买得多么廉价、被人出卖得多么高价、多么容易受到胁迫、如何受人指引去行善或者作恶——这才是调查，如此看来，意味深长的证据最好是每一个城市里人人都知道的事实真相，而在这些事实当中，最好是每一座其他城市里每一个人——根据他们从类似情形中所看到的众所周知的事——都会承认其可信的那些事实。但是，这些证据，不添枝加叶的证据，到了个人要受指责的时候会被归因于有罪之人，然而到了最后，会让民众——有权力因而也有责任的民众——深切体会到，应当归咎于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尊敬的那些人，还有那些领导他们的人。

这违反了蛊惑人心的政客集团所有的警告和规则。结果是什么呢？

在福克通过多起定罪调查并揭露了圣路易斯的行贿受贿之后，当地的帮派小集团还在一次选举中获得了多数票。现在有人说“圣路易斯的特威德时代”培养了不少反对贿赂者的公众情绪，不过在当时，当地的报刊对此比《麦克卢尔杂志》出的力要多一些。明尼阿波利斯的大陪审团揭露了那里的贪污贿赂分子、法庭审理了他们随后各个小陪审团宣判其有罪之后，一次选举证明民意成熟了。那一次选举被人看作是决选。我去那里的时候，领导过改革运动的几个人感到“所有的事儿都做完了”。然而，他们读过了“明尼阿波利斯的耻辱”这篇以后，又回头去做事，后来他们实现了一个计划，旨在保证全体市民的知情权，旨在继续为好政府而奋斗。

他们这些质朴而忙碌的市民意识到“他们义不容辞”，于是他们重新履行其公民权力义务当中自己不想承担的义务。少有怨言。在一个先进市民的会议上，有一些坦率的发言，提议为了“使明尼阿波利斯的名声保持清白”应该说点什么，可是一个人站起身来，和蔼而又坚定地说我这篇文章是确凿无疑的；这让他们相当难受，但文章是真实的，他们都知道这一点。这一席话终止了清白之议。

我回到圣路易斯，加工编写那些证据，在编写的过程中，只要事实真相允许，我就会把这些证据写得像是污蔑，当时，我在当地的朋友们对这份手稿深感不安。这篇文章会使福克先生受到伤害；它会危及这场运动；它会激怒民众。

“那正是我希望它能起到的作用。”我说。

“可是这愤怒会冲击福克和改革，不会冲击贿赂者的。”他们说。

“不是明摆着吗？”我问道，“就这个标题——‘耻辱’——直指自尊心；这暗示了一种信心，圣路易斯还有能被人触动的自尊心和被人激起的廉耻心。”

民愤太难捉摸了。因此我回应道，假如他们对这个城市没什么信心，我有；而且无论从什么角度，如果我错了而民众可能不是对犯罪而是对揭露犯罪表示忿恨，那么他们可以惩罚《麦克卢尔杂志》和我，而不要惩罚福克先生，他跟这篇文章无关。报人们警告我他们不会“支持”这篇文章，倒是会攻击它。我回答说我愿意听凭圣路易斯人在我们之间作出抉择。这篇文章是真实的，它也是公正的；圣路易斯的人们先前显得全无羞愧。这是一个好机会，来看一看他们有没有丝毫的廉耻心。他们说，我是一个小丑。“好啊，”我答道，“在古时候，每一位君王都有弄臣小丑，而这些弄臣小丑得到许可要对君王讲真话。我甘愿为美国人民充当这样的小丑。”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受到了当地报刊的攻击；福克先生的朋友们驳斥它；福克先生本人则为民众辩护。先锋市民们为一次群众大会募集资金，大会的主题是“为本市在世人面前正名”。该市的市长谴责这篇文章，这是一位十分优秀的男子汉，他曾经帮助过我。当地的贪贿参与者演讲提请人们注意那些反击“东部杂志”之人的热切愿望。当地民众自发地反驳我；此文发表之后，在圣路易斯的大街小巷，人们佩戴了20万个“福克和改革”的圆形小徽章。

然而，那些圆形小徽章是支持“福克和改革”的。它们确实适用于证明那篇文章是不符合时宜的，证明圣路易斯有自尊心，但是它们也证明了先前有人使那种自尊心受了伤。直到那个时候为止，还没有谁确切地知道圣路易斯对这一切作何感想。那里曾经有过一次选举，另一次选举也迫近了，贪贿者们——被发现了的或者将被发现的——操纵着一切，市民们没有采取过任何行动去驱逐他们。福克先生值得高度赞赏的那些努力成了一场无人唱和的演出，而且，虽然我遇到过一些对我说民众拥护福克的人，但是我也遇到过贪污者贿赂者，他们只是诅咒福克，并且打算把他们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后福克时期”一切都会好起来这样一种假定之上。在这两种本地的观点之间，没有哪个局外人能够作出选择。我怎么能够洞察一群异乡人的心思？我抱着局外人的希望，从两个方面——大小陪审团合法的裁定和贪贿者们狂妄的计划——陈述事实真相，于是实际上，其结果就是一种对丑闻案件不以为耻的心态，因为这些丑闻案件，该受谴责的是圣路易斯，是圣路易斯的人民。

后来他们意识到事实如此，该市的人们和该州的人们都意识到了，而且他们不再做旁观者。那篇文章只不过开始关注该州民众的自尊心。那么谁受了伤害呢？圣路易斯没受伤害，从那个转折点起，这个城市已经变得很坚定，要促成改革，而贿赂似乎注定要失败。福克先生没受伤害，那之后，当地民众表态支持他出任该州州长的提名，这些人建立了覆盖全州的福克俱乐部，强迫他的党和他们的人接受他，从而确保在圣路易斯市、同时也在密苏里州穷追贿赂者。《麦克卢尔杂志》或者我本人也没有受伤害。随后我再去圣路易斯，曾经募集资金要举行一次群众大会以声讨那篇文章的同一群人，特地来对我说我以前是正确的，那篇文章是如实报道，他们还要求我“再做一回”。或许有一个机会再做一回。在那之后，福克先生把密苏里的盖子掀起了一阵子，而这个州对收集起来的贪腐证据也似乎作好了充分准备。再说，州里的和市里的贿赂者联合起来，要赶在民众之前行动进而压服民众。决定性的选举没有举行，直到1904年的那个秋天为止，贿赂者们还常常指望民意的变化无常。但是我相信，密苏里和圣路易斯一道，到那时将会彻底证明，民众能够作出裁决——等到他们被唤醒的时候。

写匹兹堡的那篇文章在匹兹堡毫无影响，那篇关于费城的在费城也没

有任何效果，对那里我也不作任何指望。匹兹堡，如我在那篇文章中所述，有自知之明，因而能够从其耻辱当中摆脱困境。可是费城却满足于现状，因而似乎不可救药。但是，实际上，如我在这个系列的每一篇当中所说的那样，对它们的报道，不是为这两个得到了描写的城市而写的，是为我们每一个城市而写的；而最直接的响应并非来自得到了描写的地方，而是来自存在着相仿的罪恶或者缺少类似斗争的其他地方。例如芝加哥，纠缠于它的忧患困难麻烦纷争，认为关于其改革的调查研究对它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这一研究在别处似乎还能引起联想，而费城呢，“腐败而又满足”，在其他城市被人引为切中要害的例子，而且似乎处处都给人留下了最持久的印象。

我这些报道的实际效果自然很少。我这一年工作的真心喜悦，在于它千方百计给出的全面论证，证明我们的无耻是表面性的，证明在无耻的背后掩藏这样一种自尊心，这自尊心因其真实，迟早能够拯救我们。它是真实的。那些说你可以归罪于任何一点、就是不可以归罪于民众——这才是腐败的渊藪——的贪污贿赂者，还有那些只受奉承驱使的美国人——他们在造假象。他们在自己的周围造假象。他们，无可否认，都是美国公民；他们也属于人民的一部分；耻辱也可以打动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我力图说明白的大道理，正是福克先生那么始终如一的坚决主张：行贿受贿绝不是寻常的重罪，而是叛国罪；“这里那里、此时彼时爆发出来的腐败”并非一种偶然的过错，而是一种日常惯例；其影响就在于转变我们政府的形式，从一个代表人民的政府变为一个寡头统治的政府，代表特殊利益集团和特殊利益相关者。一些政治家已经看到这是真的，而这让他们迷惑不已。我以为，比起我的任何其他的经历来，我最为珍视的是，有那么六七回，我“非难”过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几个搞贪污贿赂的政客，后来拜访我，其中的一个带着绝妙的、一本正经的态度说话，用他的话说：

“你是对的。我从来没这么思考过腐败，不过这么思考是对的。我真不知道你是否能产生任何影响，但你是正确的，完全正确。而我全错了，我们每一个人，完全错了。我实在想象不出这以后我们会怎样阻止腐败；我会怎样转变。我不能想象，我认为。的确，我不能，现在不能。不过，听着，我或许能帮你，而且只要我帮得上我就愿意帮。我掌握的任何情况你都可以问。”

所以你瞧，他们，这些实干的政客，一般都不是那么坏的坏家伙。关于他们，我希望我能够说出更多来：他们如何帮我；他们怎样坦率无私地协助我找到证据进而得出一种基于这些证据的解释，这一解释，正如我警告他们、他们也很了解的那样，将被用来对付他们。如果我能够指出——总有一天我会的——我也应该指出，我们所怀有的那些最稳妥的希望之一，就在于贪腐政客本身。向他征求好策略；每当他出坏主意就惩罚他，每当他出好主意就奖赏他；对反贪策略有赏有罚。像这样，他往往会说出你实在不懂也实在不关心的东西，还会说你必定会受到奉承、受到愚弄——在这一点上，我要说，他错了。我真不是要奉承任何人；我讲的这个道理，最接近于我对它的理解，何况代替忿恨的还有鼓励。“明尼阿波利斯的耻辱”和“圣路易斯的无耻”之后，不光是这两个城市的市民赞成，其他城市的市民也都赞成，一个个的个人、团体、组织机构，发出数以百计的邀请，“来揭露我们吧，我们比他们更腐败。”

我们美国人可能已经变弱。我们或许贪财自私，民主政体因为我们而变得不能忍受，腐败也因为我们而变得无法规避，但是这些文章，即使它们证明不了别的什么东西，无疑证明了我们能够容忍公正；还证明了在具有美国公民美德的人的身上是有自尊心的；还证明了这种自尊心在这个国家可以成为一种力量。因此，我带着所有的善意，将这本小册子，作为一份耻辱和自尊的记录，一份不光彩的供状，还作为一个关于廉耻的宣言，献给本书的被告——美国每一个城市里的每一位市民。

1903 年 12 月写于纽约

译注：

1，麦克卢尔，S. S. McClure，Samuel Sidney McClure，1857—1949，美国编辑兼出版家，《麦克卢尔杂志》的创办人。生于爱尔兰，九岁随寡母移居美国，家境贫困，他自食其力就读诺克斯学院，1882 年毕业到纽约，担任各类小编辑工作两年后，成立麦克卢尔企业，为美国最早的报纸稿件供应中心，同时向会员报社提供新闻题材。1893 年设立出版《麦克卢尔杂志》，使之成为低价位报刊中的佼佼者。他的作品有《和平之障碍》（1917 年）、《自由的成就》（1935 年）等。<http://en.wikipedia.org/wi->